



从结构到解构

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

[法] 弗朗索瓦·多斯 (François Dosse) 著

季广茂 译

〈 上卷 〉

法国文化革命的百科全书
西方思想巨变的忠实纪录

史诗般的巨著
小说般的享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从结构到解构

· 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 ·

[法] 弗朗索瓦·多斯 (François Dosse) 著

季广茂 译

〈 上卷 〉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上卷 结构主义篇

结构主义不是一种新方法,而是被唤醒的杂乱无章的现代思想意识。

——米歇尔·福柯

鸣 谢

感谢所有慷慨应允并接受访谈的人们,这些访谈全都转引于此。为这段法国知识生活树碑立传,对于这一目标而言,他们的贡献是绝对必要的。每个接受访谈者的研究领域及联系方式,都可以在附录中找到。

他们是:马克·阿伯莱(Marc Abèles)、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米歇尔·阿列塔(Michel Aglietta)、让·阿卢什(Jean Allouch)、皮埃尔·安萨尔(Pierre Ansart)、米歇尔·阿里韦(Michel Arrivé)、马克·奥热(Marc Augé)、西尔万·奥鲁(Sylvain Auroux)、科斯塔斯·阿克塞洛斯(Kostas Axelos)、乔治·巴朗迪耶(Georges Balandier)、艾蒂安·巴里巴尔(Étienne Balibar)、亨利·巴尔托利(Henri Bartoli)、米歇尔·博德(Michel Beaud)、达尼埃尔·贝克蒙(Daniel Becquemont)、让-马里·伯努瓦(Jean-Marie Benoist)、阿兰·布瓦西诺(Alain Boissinot)、雷蒙·布当(Raymond Boudon)、雅克·布弗雷斯(Jacques Bouveresse)、克洛德·布雷蒙(Claude Brémont)、于贝尔·布罗希耶(Hubert Brochier)、路易-让·卡尔韦(Louis-Jean Calvet)、让-克洛德·舍瓦利耶(Jean-Claude Chevalier)、让·克拉夫勒尔(Jean Clavreul)、克洛德·孔泰(Claude Conté)、让-克洛德·科凯(Jean-Claude Coquet)、玛丽亚·达拉齐(Maria Daraki)、让-图桑·德桑蒂(Jean-Toussaint Desanti)、菲利普·德科拉(Philippe Descola)、攀尚·德孔布(Vincent Descombes)、让-马里·多梅纳克(Jean-Marie Domenach)、若埃尔·多尔(Joël Dor)、达尼埃尔·多里(Daniel Dory)、罗歇-波尔·德鲁瓦(Roger-Pol Droit)、让·迪布瓦(Jean Dubois)、乔治·迪比(Georges Duby)、奥斯瓦尔德·迪克鲁(Oswald Ducrot)、克洛德·迪梅齐(Claude Dumézil)、让·迪维尼奥(Jean Duvignaud)、罗歇·埃斯塔布莱(Roger Estabiet)、弗朗索瓦·埃瓦尔德(François Ewald)、阿莱特·法尔热(Arlette Farge)、让-皮

埃尔·费伊 (Jean-Pierre Faye)、皮埃尔·富热罗拉 (Pierre Fougeyrollas)、弗朗索瓦丝·加代 (Françoise Gadet)、马塞尔·戈谢 (Marcel Gauchet)、热拉尔·热奈特 (Gérard Genette)、让-克里斯托夫·戈达尔 (Jean-Christophe Goddard)、莫里斯·戈德利耶 (Maurice Godelier)、吉勒·加斯东-格朗热 (Gilles Gaston-Granger)、弗拉迪米尔·格拉诺夫 (Wladimir Granoff)、安德烈·格林 (André Green)、阿尔吉尔达斯·朱利安·格雷马斯 (Algirdas Julien Greimas)、马克·吉尔劳姆 (Marc Guillaume)、克洛德·阿热日 (Claude Hagège)、菲利普·阿蒙 (Philippe Hamon)、安德烈-乔治·奥德里古 (André-Georges Haudricourt)、路易·艾 (Louis Hay)、保罗·亨利 (Paul Henry)、弗朗索瓦丝·埃尔蒂热-奥热 (Françoise Héritier-Augé)、雅克·瓦罗 (Jacques Hoarau)、米歇尔·伊扎尔 (Michel Izard)、让-吕克·雅马尔 (Jean-Luc Jamard)、让·雅曼 (Jean Jamin)、朱丽娅·科里斯蒂娃 (Julia Kristeva)、贝尔纳·拉克斯 (Bernard Laks)、热罗姆·拉勒芒 (Jérôme Lallèment)、让·拉普朗什 (Jean Laplanche)、弗朗辛·勒布雷 (Francine Le Bret)、塞尔日·勒克莱尔 (Serge Leclaire)、多米尼克·勒古 (Dominique Lecourt)、亨利·勒菲弗尔 (Henri Lefebvre)、皮埃尔·勒让德尔 (Pierre Legendre)、热妮·勒穆瓦纳 (Gennie Lemoine)、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Claude Lévi-Strauss)、雅克·莱维 (Jacques Lévy)、阿兰·利皮耶茨 (Alain Lipietz)、勒内·卢罗 (René Lourau)、皮埃尔·马舍雷 (Pierre Macherey)、勒内·马若尔 (René Major)、塞尔日·马丁 (Serge Martin)、安德烈·马蒂内 (André Martinet)、克洛德·梅拉苏 (Claude Meillassoux)、夏尔·梅尔曼 (Charles Melman)、热拉尔·芒代尔 (Gérard Mendel)、亨利·密特朗 (Henri Mitterand)、朱昂-大卫·纳西奥 (Juan-David Nasio)、安德烈·尼古拉 (André Nicolaï)、皮埃尔·诺拉 (Pierre Nora)、克洛迪娜·诺尔芒 (Claudine Normand)、贝特朗·奥格尔维 (Bertrand Ogilvie)、米丝尔·佩罗 (Michelle Perrot)、马塞兰·普利耐 (Marcelin Pleynet)、让·普永 (Jean Pouillon)、若埃勒·普鲁斯特 (Joëlle Proust)、雅克·朗西埃 (Jacques Rancière)、阿兰·勒诺 (Alain Renaut)、奥利维耶·勒沃·达隆内 (Olivier Revault d'Allonnes)、伊丽莎白·鲁迪奈斯科 (Élisabeth Roudinesco)、尼古拉·吕威 (Nicolas Ruwet)、穆斯塔法·萨福安 (Moustafa Safouan)、乔治-埃利亚·萨尔法蒂 (Georges-Elia Sarfati)、贝尔纳·西谢尔 (Bernard Sichère)、丹·斯佩尔伯 (Dan Sperber)、约瑟夫·森普夫 (Joseph Sumpf)、伊曼纽尔·泰雷 (Emmanuel Terray)、茨维坦·托多罗夫 (Tzvetan Todorov)、阿兰·图雷纳 (Alain

Touraine)、保罗·瓦拉迪耶(Paul Valadier)、让-皮埃尔·韦尔南(Jean-Pierre Vernant)、马克·韦尔内(Marc Vernet)、塞尔日·维德曼(Serge Viderman)、皮埃尔·维拉尔(Pierre Vilar)、弗朗索瓦·瓦尔(François Wahl)、玛丽娜·亚热罗(Marina Yaguello)。

还有一些人虽然取得了联系,却没有达到访谈的目的。他们是:迪迪埃·安齐厄(Didier Anzieu)、阿兰·巴迪乌(Alain Badiou)、克里斯蒂安·博德洛(Christian Baudelot)、让·博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乔治·康吉扬(Georges Canguilhem)、科尔内留斯·卡斯托里亚迪(Cornélius Castoriadis)、埃莱娜·西库(Hélène Cixous)、塞尔日·科特(Serge Cotte)、安托万·居里奥利(Antoine Culioli)、吉勒·德勒兹(Gilles Deleuze)、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路易·迪蒙(Louis Dumont)、朱利安·弗洛恩德(Julien Freund)、吕斯·伊里加雷(Luce Irigaray)、弗朗西斯·雅克(Francis Jacques)、克里斯蒂安·让贝尔(Christian Jambet)、卡特琳·凯尔布拉-雷西奥尼(Catherine Kerbrat-Orecchioni)、维克多·卡拉迪(Victor Karady)、塞尔日-克里斯托夫·科尔姆(Serge-Christophe Kolm)、克洛德·勒福尔(Claude Lefort)、菲利普·勒热纳(Philippe Lejeune)、埃马纽埃尔·勒维纳(Emmanuel Lévinas)、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Jean-François Lyotard)、热拉尔·米勒(Gérard Miller)、雅克-阿兰·米勒(Jacques-Alain Miller)、让-克洛德·米尔纳(Jean-Claude Milner)、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泰蕾兹·帕里佐(Thérèse Parisot)、让-克洛德·帕斯龙(Jean-Claude Passeron)、让-贝特朗·蓬塔利(Jean-Bertrand Pontalis)、保罗·利科尔(Paul Ricoeur)、雅克利娜·罗米伊(Jacqueline de Romilly)、弗朗索瓦·鲁斯唐(François Roustang)、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路易-攀尚·托马(Louis-Vincent Thomas)。

我还要感谢下列人士,他们的艰巨使命就是阅读本书初稿。他们的批评和建议使得我做起这项工作来,不再感到力不从心。他们是:达尼埃尔·贝克蒙(Daniel Becquemont)和特吕蒂·贝克蒙(Trudi Becquemont)、阿兰·布瓦西诺(Alain Boissinot)、勒内·热利(René Gelly)、弗朗索瓦·热兹(François Gèze)、蒂埃里·帕科(Thierry Paquot)。

下列人士为我提供了有关这个时期的诸多书籍,我在此深表谢意。他们是:子夜出版社(Éditions du Seuil)的莫妮克·吕兰(Monique Lulin),伽利玛出版社(Éditions Gallimard)的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德库韦尔出版社(Éditions La Découvert)的克里斯蒂娜·席尔瓦(Christine Silva)。

序 言

在法国知识生活史上,结构主义在五六十年的功成名就,是史无前例的。结构主义赢得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如此广泛的支持,以至于在我们所谓的结构主义鼎盛时期,任何微不足道的抵抗和异议都会胎死腹中。如果领悟了当时的语境,那么我们会更好地理解,何以如此众多的知识分子陶醉于完全相同的纲要之中。

结构主义之所以能显赫一时,原因有二。第一,结构主义承诺提供严密、精确的方法,并希望在寻求科学性(*scientificité*)的征程中迈出决定性的一步。但是更为重要的是,第二,它是思想史上的一个特殊时刻,我们可以将其视为批判意识发展的关键性时刻。结构主义的纲要引起了特别广泛的狂热者的关注,包括国家足球队教练。在60年代,这位教练宣称,为了取得更好的战绩,他对足球队进行了“结构主义”改组。

因此,结构主义范式的大获全胜,是特定历史语境下最早的产物之一,是19世纪末以来,特别是1945年以来,西方一步步地走向列维-斯特劳斯所谓的时间冷藏器(*temporalité refroidie*)的日积月累的结果。但同时它还是社会科学显著成长的产物,它与老态龙钟的索尔邦迎头相撞,而索尔邦当时是学术正当性的持有者,也是人文学科的施与者。结构主义纲要真正的无意识策略,就是搬开大权在握的学院主义。它要达到双重目的:既要大胆竞争,又要反对主流文化。在学术的范围内,结构主义确立的范式成功地净化了被禁知识(*savoir proscrit*)的基础,这些知识早就被抛之野外,处于正规机构(*institutions canoniques*)的边缘地带了。

结构主义是对西方历史上一个特定时刻的抗争与回应。在一定程度上,它表达了自我仇恨,表达了对传统西方文化的拒绝,表达了在寻求新模型(*modèles nouveaux*)的过程中对现代主义的渴求。古代的价值观念不再

有口皆碑。与此同时,结构主义展示了极强的感受力,它对在西方文化中遭受压抑之物心有灵犀。因此,这一时期的两门主导性科学(人类学和精神分析),都赋予无意识以特权,这绝非偶然。无意识处在显在意义(sens manifeste)之下,因为在西方长期遭受压抑而无人能够接近。

结构主义也处于这样一个时代:语言学成了科学的领头羊,它带领社会科学一步一步地迈向科学的至境。在这方面,结构主义成了一面大旗,“今派”(des modernes)扛着它与“古派”(les anciens)一决雌雄。作为20世纪后半叶社会思想的觉醒,对于许多具有政治义务感的知识分子而言,结构主义还成了用来完成非意识形态化(désidéologisation)使命的工具。这是一个以觉醒为标志的特定的政治时刻,也是一个特定的知识配置,它需要一场革命才能成功地完成一项改革。只有具备了这一切,才能使结构主义成为整整一代人的聚集地。这一代人发现了隐藏在结构网格(la grille structural)下面的世界。

面对存在主义造成的混乱局面,结构主义努力寻求解决方案,这导致了结构本体化的倾向。在科学的名义下,结构成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另一个选择对象。在这个时期,结构主义可谓野心勃勃,知识的分界线被不断重新划定,图表的疆界也一再得以扩展。许多人都踏着最新的道路蜂拥而行,而这些最新道路是由处于鼎盛期的社会科学开辟出来的。

不过,突然间乾坤逆转。80年代初,悲剧降临到结构主义头上。在同样的猝然打击下,这一国际史诗中的多数法国主人公,纷纷离开了生命的舞台,仿佛这些终结人文学科的理论家们在辉煌的死亡中,不谋而合地放弃了自己的生命。

1979年10月3日,尼科斯·普兰查斯从自家的窗子跳下,结束了自己的一生。那时,他刚刚为自己背叛皮埃尔·戈尔德曼的行为做完辩护。他的自杀,是对纯然



罗兰·巴特

假想出来的犯罪行为的肉体惩罚。

在与雅克·贝尔克、弗朗索瓦·密特朗（当时的社会党主席）共进午餐之后，罗兰·巴特在赶往学校的路上，被一家干洗店的卡车撞倒了。巴特只是受了点轻微的脑颅外伤。但是，据去萨彼里埃医院^{〔1〕}探望过他的目击者称，巴特破罐子破摔，最终在 1980 年 3 月 26 日呜呼哀哉了。

在 1980 年 11 月 16 日的夜间，路易·阿尔都塞掐死了忠贞的妻子埃莱娜·阿尔都塞。法庭判决，这位最严格的理性主义的杰出代表人物不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并被安置在圣安娜医院（Sainte-Anne）就医，这多亏了他以前的哲学老师让·居东的援手。圣安娜医院是一所精神病院，此前一直被视为巴黎市区的私人诊所。

1981 年 9 月 9 日，雅克·拉康这位能言善辩之人，这位现代伟大的萨满教巫师死了，死前患有失语症。

刚刚过去几年，死神的黑旋风又掠走了迈克尔·福柯的性命。在声望如日中天之时，在完全沉浸到性史的著述中时，福柯受到 20 世纪新瘟疫（艾滋病）的打击。他死于 1984 年 6 月 25 日。

如此众多的前赴后继的戏剧性死亡，强化了这样的印象：一个时代终结了。有人甚至从理论上概括这些悲剧性事件，认为这些悲剧性事件表明，一种共同思维方式已经陷入绝境，一般把这种共同思维方式称为结构主义。如此说来，沉思默想与现实世界的断裂，导致了自我毁灭。与 60 年代的间接赞美相比，把沉思默想与现实世界并置一处，显得更加虚假不实。在 60 年代，结构主义誉满天下，与其一道，“四个火枪手”也头顶鲜花。那时他们是五人：迈克尔·福柯、路易·阿尔都塞、罗兰·巴特、雅克·拉康，还有他



“四个火枪手”（福柯、拉康、列维-斯特劳斯和巴特）

们共同的父亲,即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不过,集体性遇难还是成了法国知识风景中的一个重要事件。思想大师们(让-保罗·萨特也必须包括在内)的陨落,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即“怀疑的时代”。80年代初,思古之幽情弥漫开来。当时流行的是,怀着以敬畏和迷恋相交织的矛盾情感,回忆那些人物。而这种矛盾情感,是由他们异乎寻常的命运激发出来的,这把他们转换成了大致相同的英雄。就在某些人欢天喜地地签署结构主义的死亡证明时,根据《读书》(*Lire*)1981年4月发表的一份调查表可知,这个团体依然生生不息,依然具有影响力。那时数百个作家、记者、教授、学生和政治家接受了调查,“依你之见,在法语界,其著作对哲学、文学、艺术、科学等产生了最伟大、最深刻影响的三个在世的知识分子是谁?”面对这个问题,他们的回答是: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101)、雷蒙·阿隆(84)、米歇尔·福柯(83)和雅克·拉康(51)。

结构主义一词,既令人热血沸腾,又令人芒刺在背。结构在拉丁语中是 *struere*,直接来自 *structura*,最初只具有建筑学的意义。结构指的是“一种建筑样式”(*Dictionnaire de Trévoux*, éd. de 1771)。在17和18世纪,“结构”一词的意义被更改和拓宽了,有人以之类比活的生灵。丰特内勒把人体视为建筑,沃拉热和贝尔诺把语言视为建构。渐渐地,这个术语开始用来描述具体物体的各个部分构成一个整体所采取的方式,因而也能够用来描述形形色色的结构了,包括解剖学、心理学、地质学、数学的结构。在此之后,结构方法才被应用于社会科学。对于斯宾塞、摩根和马克思而言,这个术语描述的是把整体之部分连接成整体的持久现象(*phénomène durable*)。“结构”一词在黑格尔那里全无踪迹,在马克思那里也是偶尔用之,惟一例外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序言。“结构”一词是在1895年由涂尔干在《社



Emile Durkheim

埃米尔·涂尔干

会学方法之规则》(*Les Règles de la méthode sociologique*)一书中确立的。在 1900~1926 年期间,结构派生了结构主义,安德烈·拉朗德在《辞海》(*Vocabulaire*)中还称之为新词。对于心理学家来说,结构主义是在 20 世纪初应运而生的,它是专门用来反抗功能心理学的^[2]。但是就其现代意义而言,就其应用于全部人文科学的规模而言,此一实践的真正起源得益于语言学领域的发展。索绪尔在其《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中,只有三次用到“结构”一词。后来,布拉格小组(特鲁别茨柯伊和雅各布森)概括了“结构”与“结构主义”的用法。丹麦语言学家叶姆斯列夫声称,可以把“结构主义”一词当成一个基本范式来用,而他的所作所为为进一步明确了这个倾向。1939 年,他找到了一卷《语言学学报》(*Acta linguistica*),其首篇论文就以“结构语言学”为题。从这一角度看,此一术语在所有社会科学领域都带来了真正的革命,并成为 20 世纪的核心。各门社会科学都相继承认,它们受到了科学的洗礼。

这究竟是惊人的奇迹,还是空中的楼阁?毕竟,科学史不过是科学理论的墓地史而已。这当然不是说,被甩在身后的每一个阶段都已成为一堆废物;而是说,任何纲要都已经失去其能产性(*productivité*),并经历方法论的更新。不过,和结构主义一道,变革也冒了一定的风险,即跌入以前的方法竭力避开的陷阱。在认清其局限性之前,有必要首先阐明结构主义的丰富性和能产性。这正是我们所要承担的风险之所在。尽管结构主义有时也钻死胡同,但它还是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认识人类社会的方式,以至于如果不考虑结构主义的革命,我们甚至都不会思考问题了。

结构主义的到来也是我们知识史的一环,它开辟了社会科学研究异常繁荣的时代。重建其历史无疑是棘手的,因为“结构主义”疆界的轮廓含混不清。为了理解这个时期的大致情形,我们必须重建其方法,重塑其人物。与此同时,在不采取化约主义立场的同时,寻找某些具有凝聚力的核心。因为超越了名目繁多的对象和学科,这些核心也揭示了纲领的母体。要划分不同的层面,要辨析众多的结构主义,虽然它们均以“结构主义”一词为根基。我们可以澄清基本的知识争端,这些争端既是理论性的也是学科性的;我们可以追寻每个轨迹带来的财富,这是难以在群体历史中一言以蔽之的。虽然它揭示了某些意外而重要的相遇的偶然性,但这部历史著作还是要努力融合不同的对象,带来诸多解释性因子,而丝毫不将其化约为任何单一的因果性。

社会科学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使用结构主义。各种借来的观念、类比、转

喻在相互作用,而我们有义务——将其澄清。此外,遵循着罗兰·巴特对未来的研究结构主义的历史学家的忠告,我们将提出一个分类,该分类与学科的划分并不完全一致。科学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s scientiste)特别明显地展示在列维-斯特劳斯、格雷马斯和雅克·拉康那里,同时它还涉及人类学、符号学和精神分析。与寻求天然法则相关的,是更加伸屈自如、起伏不定、熠熠生辉的结构主义,这可以在热拉尔·热奈特、茨维坦·托多罗夫、米歇尔·塞尔的著作中找到,我们可以称之为记号学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s sémiologique)。最后,还有历史化的或认知性的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s historicisé ou épistémique)。路易·阿尔都塞、皮埃尔·布尔迪厄、米歇尔·福柯、雅克·德里达、让-皮埃尔·韦尔南,或者广而言之,《年鉴》(Annales)的整个第三代,都可以划入此列。不过,在超越了这些分类之后,我们可以确立他(它)们在语言上和目标上所具有的共同性,它予人以这样的印象,我们正在阅读同一部书,尽管它们的风格五光十色,它们的学科五花八门。正是因为风格和学科上存在差异,我们才能把巴特与福柯、德里达、拉康区分开来。结构主义是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共通语^[3],尽管并不存在学说上的千篇一律,甚至不存在一个学派,在形形色色的代表之间也没有发生什么大的争执。

与对结构主义进行分期相比,重建这一时期的历史,也容易不到哪里。在50年代,人们清清楚楚地看到了结构现象无可抗拒的增长。到了60年代,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采用了货真价实的结构主义模式。1966年以前,结构主义一直处于上升期,其上升的势头似乎是难以遏止的。1966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结构主义活动在知识界强劲有力地声名远播起来,记号世界的融合也开始大放异彩,并超出了既定的学科界限。不过,到了1967年,结构主义开始衰微,批评之声不绝于耳,疏远结构主义方法的做法悄然流行。伴随着新闻界的一片赞美声,这一势头从各个方面显示出来。如果说结构主义的退潮在1967年只是隐约可见的话,那么到了1968年,一切都昭然若揭了。这一年,“四个火枪手”不约而同地与结构主义现象分道扬镳了。

不过,还有另外一种时间性(temporalité),它没有受到知识时尚变迁的侵袭。大学研究一如既往地繁荣着,尽管黄土已经埋到了脖子上。大学研究仿佛一个纲要的众多源泉,在媒体的迷惑之下,它已经丧失了它在教学有效性中积累起来的一切。这倒不是说存在着单一的学术时间性,因为在人文学科中,总是存在着或长或短的延迟时间。比如,对于语言学、社会学、人

类学或精神分析来说，结构主义提供了一个拿手的科学模型。而另外一些学科，比如历史，因为长期根植于大学，没有受到认识论骚乱（*turbulences épistémologique*）的干扰，所以总是在稍迟一些的时候脱胎换骨，采纳结构主义的纲要。可是到了这时，结构主义的衰退已经势不可挡了。尽管在这场知识交流的游戏巾存在着暂时的延迟，结构主义还是使许多对话成为可能，使富有成效的座谈会的数目成倍地增加，派生出更加的研究，激发起人们对相关学科的著作及进展情况的兴趣。这是一个激情澎湃的时代，激情是由这样的思想们激发起来的：他们一直试图协调研究与生活之间的矛盾，使其和谐相处。这场货真价实的革命依然影响着我们的世界观。

我们这个时代，有人称之为**空虚年代**（*L'ère du vide*），有人称之为**后现代**（*post-modernité*）。无论称之为什么，它总是需要一种审视人的方法。依据这种方法，两极对立（每一极都是幻想出来的）被终结了。一极是人的瓦解，一极是人的圣化，前者为结构主义所独钟，后者则是对前者的回应。一旦超越了时代的限制，人这个创造者就会成为人之死亡的镜像。为结构方法的范式而迷失的人性，再次显现在有关前社会科学时代的自恋意象中。巨大的结构浪潮把社会科学冲向岸边，在那里，历史性（*historicité*）是一个陌生的怪物。但是我们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这表现在对古代书写形式的回归。回归是在下列名义下完成的：思想的退潮，价值的迷失，对传统的依赖。识途的老马归来了：维达尔式（*vidaliens*）的风景诱人的魅力，拉维斯式（*lavissienne*）的历史英雄的业绩，拉加德与米沙尔（*Lagarde et Michard*）的国家文学宝库中的杰作。这是对 19 世纪的回归，诱使人们超越这一回归的是 18 世纪对人的看法。在那时，人被设想为某种抽象，他摆脱了时间的制约，精通合法的政治制度，而这样的政治制度是人类理性主义的象征。

不过，如果没有哥白尼—伽利略革命，如果没有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决裂，如果没有社会科学的进步，我们会如此这般对人进行反思吗？挑明结构主义的短处，并不意味着要回到启蒙运动的黄金时代。恰恰相反，这样做，为的是走向未来，确立历史人文主义。指出虚假的信仰和真实的教条，揭示化约主义的机械的程序，质疑社会科学跨学科使用的横向概念的有效性，这些都是十分必要的。这样做，不是为了确立一个包罗万象的程序或无形流程，而是要从布朗式的运动（*mouvement brownien*）中，夺回人文科学的绪论，它是由某些概念和可操作的结构层面组成的。

我们要考察社会科学所取得的进步，以此回应人文主义的诞生。人文

主义的诞生是可能的,或许还是围绕着对话人的过渡形象形成的。超越结构主义,需要回到人文主义那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考察为一切社会科学所广泛采用的结构方法,叙述其横扫天下的各个阶段,评价使某个方法为所有的社会科学所采纳的过程,理解其局限和绝境(在这里,脱胎换骨的努力全都以失败告终)。

为了说明发生在五六十年代的法国知识篇章,我们请众多的创始者及其门徒评论这个时期的主要著作,也请其他流派的参与者和潮流的支持者,对这些著作投去批判的一瞥。对哲学家、语言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精神分析学家以及经济学家所做的大量访谈,已经融入这些文字。而且他们还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结构主义对于他们的著作和研究的重要性,以及超越结构主义的各种可能的途径。这个两卷本的调查揭示出,尽管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结构主义现象的核心性使得对结构主义进行分期成为可能。^[4]

试图进一步分解西方形而上学,在记号学的基础上洞悉其裂隙,腾空每一个所指和全部意义以使纯粹的能指更加有效地自由流通,这样的批评形式属于西方历史上的自恨时期。我们已经被这一时期远远地甩在身后,这多亏了知识界与自由价值逐渐达成的妥协。要走出这个被批评范式命名的时期,盲目地回到老路上是行不通的。尽管如此,回归还是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一时期。这个时期的贡献在于,它已经无可逆转地改变了我们对人类的理解。

注 释

[1] 萨彼里埃(Pitié-Salpêtrière)医院成立于1613年,是巴黎第六大学的附属医院,位于巴黎第十三区,据说是欧洲最大的医院之一。——译者注

[2] 在我国的心理学中,“结构主义”一般译为“构造主义”。——译者注

[3] 共同语(*koiné*)是一种折中语言,通常由一种语言的几个方言构成,但多以一种主要方言为主。共同语一名来源于希腊“共同”一词,作为专有名词开始是指雅典希腊语。——译者注

[4] 这项调查由两卷组成,分别对应结构主义发展的两个主要阶段:上升期(上卷《结构主义篇,1945~1966》)、衰败期(下卷《解构主义篇,1967年至今》)。

目 录

鸣 谢.....	1
序 言.....	4

第一部 50年代:史诗时期

1. 巨星陨落:让-保罗·萨特	(3)
让·普永:站在中间地带的人(6)——好战知识分子的危机(9)	
2. 英雄出世: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14)
大海在呼唤(16)——科学野心(18)——反对功能主义和经验主义(19)——引进语言学模型(22)	
3. 自然与文化相交:乱伦	(25)
普遍常数(26)——与雅各布森相遇(29)——轰动一时的事件(33)	
4. 寻求纲要:莫斯	(36)
无意识(38)——感谢马塞尔·莫斯(40)——一种形式的康德主义(41)	
5. 不群不党:乔治·迪梅齐	(44)
三功能论(47)	
6. 现象学之桥	(51)
现象学纲要(52)——颠覆范式(53)	
7. 索绪尔式断裂	(59)
决裂之主题(62)——共时性开始流行(64)——语言学的密封圈	

- (65)——两个索绪尔(66)——缺席的主体(68)
8. 十项全能:罗曼·雅各布森 (71)
莫斯科语言小组(72)——布拉格小组(75)——接受精神分析
(78)
9. 没有飞机的领航科学:语言学 (81)
外围包括核心(83)——法国的突破口:安德烈·马蒂内(86)——
非传统之路:安德烈-乔治·奥德里古(87)
10. 在亚历山大门前 (90)
叶姆斯列夫同源衍生(91)
11. 结构主义的母性形象:罗兰·巴特 (96)
零度写作(97)——人生之路(99)——神话学(101)——新美学
(103)
12. 认知上的紧迫性 (107)
盖罗尔的方法(108)——盖罗尔对现代性的回应(110)——首先是
认识论(112)——卡瓦耶:“概念哲学”(114)——巴什拉与决裂
(115)——康吉扬的种子角色(116)——科学话语的场地
(119)——米歇尔·塞尔的逻辑分析(121)
13. 一个叛逆名叫雅克·拉康 (125)
音步划分(131)——重读弗洛伊德(133)
14. 罗马在呼唤(1953):回到弗洛伊德 (137)
必要的飞跃(140)——决裂(142)——条条大路通罗马(142)——
绕道索绪尔,回到弗洛伊德(146)——像语言那样结构起来的无
意识(148)
15. 无意识:符号世界 (154)
列维-斯特劳斯与弗洛伊德主义(155)——符号无意识
(157)——心灵(158)——对抗:精神分析与人类学(159)——沿
着列维-斯特劳斯的足迹,拉康采用了无意识(160)
16. 实在界/符号界/想像界(RSI):异端 (166)
拉康是一位结构主义者吗?(167)——博讷瓦勒:无-意识(169)
17. 热带的呐喊 (174)
论争:凯卢瓦与列维-斯特劳斯(176)——一本使自己名声大噪
的书:《忧郁的热带》(179)——驰名的成功之作(182)——哲学家的
改宗(186)——印度通这一极(190)——勒鲁瓦-古尔让与技

- 术这一极(191)
18. 理性在咆哮:米歇尔·福柯的著作 (196)
- 明星出世(198)——精神疾病(201)——寻找心灵的边界
 (202)——流放(204)——论文(205)——让沉默者说话:疯癫
 (206)——疯癫与无理性(209)——排斥还是整合?(211)
19. 马克思主义危机:解冻还是重新冰冻? (215)
- 1956:决裂年代(216)——结构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危机的产物
 (220)——解冻(221)——重新冰冻?(223)
20. 法国经济学派踏上了结构之路 (225)
- 国家与结构的联姻(226)——会合:弗朗索瓦·佩鲁(228)——草
 创经济人类学(230)——经济计量学(230)
21. 试试那结构吧! (233)
- 瑟里西的献祭仪式:发生结构主义(234)——结构人类学及其霸
 主之心(235)——结构的本体化(239)——列维-斯特劳斯的语
 言学支柱:一个战略选择(240)——历史转向结构(241)——历史
 人类学:让-皮埃尔·韦尔南(243)——列维-斯特劳斯的献祭
 (245)

第二部 60年代:1963~1966,美好年代

22. 角逐索尔邦:古今之争 (253)
- 安德烈·马蒂内回来了(253)——寂寞的革新者:让-克洛德·
 舍瓦利耶(255)——茨维坦·托多罗夫遭遇真空(256)——文学
 研究中的不满(258)——现代性之远征(260)——日益增长的泡
 沫(263)
23. 1964:记号学探险的新进展 (270)
- 《交流》第4期:记号学宣言书(272)——巴特界定结构主义活动
 (275)——受命于危难之际(277)
24. 形式思维的黄金时代 (281)
- 结构语义学:格雷马斯主义(282)——符号学家巴特(287)——为
 严密性辩护的意识形态(291)——拉康:通往逻辑学的道路的弯
 曲处(293)
25. 大对抗 (299)